

## 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

高津孝

### 摘 要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為了建設近代國民國家，創建了（東京）帝國大學，旨在培養既精通西洋語言又掌握西洋技術的急需人才。後來，人們意識到，沒有競爭的大學勢必走向衰退。於是，明治30年，日本政府又創建了另一所大學——京都帝國大學（1893）。在歷經日清、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開始考慮追趕歐美列強並向世界衝擊。從領土擴張到「亞洲盟主意識」，甚至在知識學術領域也謀求走到前面。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學恰好體現了這一點，它忠實地經歷了日本近代化事業的完整過程：切斷江戶以來的日本漢學傳統，將中國古典完全轉化為外國文化，導入尚未廣為人知的中國的最新學術——清朝考證學，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吸收歐洲中國學的方法論，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並結出了豐碩果實。

關鍵詞：京都帝國大學、中國學（支那學）、中國古典文學、訓讀

---

2011/10/15 投稿，2011/12/18 審查通過，2011/12/26 修訂稿收件。

\* 高津孝現職為日本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教授。

## **Sinology at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TAKATSU Takashi

### **Abstract**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1868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in Tokyo with the purpose of fostering superior human resources mastering Western languag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rder to build a modern nation state. In 1897,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on the grounds that a university having no rival would inevitably decline. After the Japanese-Sino War and the Japanese-Russo Wa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hich began aiming for global expansion to counter the world powers, struggled for dominance in the academic world with a sense of being the leader of Asia and as a sign of territorial ambition. Sinology at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embodying the desire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very faithfully pursued this Japanese modernization proje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tudy of old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Ching dynasty which had not been fully introduced to Japan at the time, it provided research in unexplored fields using the methodology of European Sinology.

Keywords :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Sinology,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Japanese readings of Chinese texts

---

\* Professor, Faculty of Law, Economics, Humanities, Kagoshima University.

## 一、國民國家之大學制度

在目前的日本，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人基本上都任職於各大學以及與大學有關的各個機構。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與大學制度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當然，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文學研究均受惠於大學制度，但中國文學研究與日本文化的歷史形成關係甚切，故其產生和形成又有不少獨特之處。

現代日本的大學制度始於明治，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正是伴隨著明治時代日本作為國民國家的形成而展開的。本文將以京都帝國大學為案例，著眼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與帝國大學制度這一特殊關係，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中國文學研究進行考察。

京都帝國大學歷來被人稱作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嫡長子，<sup>1</sup>所以我們首先要回顧一下（東京）帝國大學的誕生過程。在日本，最早設立冠名「大學」的高等教育機構，是在明治 10 年（1877）的時候。明治維新以後，政府要迅速推進近代化和產業化發展，迫切需要大量專業人才。由於面臨作為近代國家如何自立這一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招聘國外人才，而急需在自己的國家自主培養人才。日本最初主要是倚重由海外各國招聘的「雇傭外國人」，啓動了近代化產業化進程，隨之而來，設立學校，培養人才就成了十分緊迫的大事。明治 2 年（1869），明治政府對舊幕府的最高學府「昌平坂學問所」進行改組，建立了進行國學・漢學教育的「大學本校」、以及進行西學教育的「開成學校」（洋書調所）和醫學學校——「大學南校」和「大學東校」。然而，在「大學本校」方面，國學派和漢學派不斷對立爭鬥，<sup>2</sup>於是「大學本校」於明治 3 年遭到廢止。政府開始計劃建設以西學為中心的歐洲式大學，剩下的「大學南校」和「大學東校」被視為大學的準備階段。明治 6 年，大學南校變成「開成學校」（專科學校）；明治 7 年，大學東校也變成了東京醫學校

<sup>1</sup> 有關東京帝國大學的情況，均據以下文獻：天野郁夫 AMANO Ikuo：《大學の誕生 帝國大學の時代》*Daigaku no tanjô Teikoku daigaku no jidai* 上・下（東京[Tokyo]：中央公論社[Chûô kôron sha]，2009 年）、東京大學百年史編輯委員會 Tokyo daigaku hyakunen shi henshû iinkai：《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一》*Tokyo daigaku hyakunen shi bukyoku shi ichi*（東京[Tokyo]：東京大學出版會[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86 年）、東京帝國大學 Tokyo teikoku daigaku：《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Tokyo teikoku daigaku gojûnen shi*（東京[Tokyo]：東京帝國大學[Tokyo teikoku daigaku]，1932 年）。

<sup>2</sup> 所謂國學是形成於江戶時代的一種學問和學派，以日本的古典為研究對象，而非中國古典和佛典。國學使用文獻學研究方法，以探究日本古代文化和日本的固有思想為目的。這一派強調日本的優越性，具有偏狹的排外主義的一面。所謂漢學系指相對於國學的中國古典研究和中國古典詩文創作。

（專科學校）。明治 10 年，兩校合併，成立了東京大學，由法學部、理學部、文學部和醫學部構成。在文學部，還設立了和漢文學科。在以往全部用西語進行西學教育的高等教育機關，這是第一個使用日語進行教學的學科。目的乃是為了保護在明治維新以來西學盛行的熱潮中不斷衰落的傳統學術。在教育內容上，漢文學方面主要學習經書等中國古典以及漢文作文等。學科設立之初，中村正直（1832-1891）和信夫粲（1835-1910）被任命為漢文學講師。

中村正直，其父是德川幕府的小官員，正直曾在昌平坂學問所就學，安政 2 年（1855）成為昌平坂學問所教授，文久 2 年（1862）任德川幕府的儒官，慶應 2 年（1866）赴英國，任幕府遣英留學生監督。明治維新後回國，住在靜岡。明治 3 年（1870）年，翻譯出版了塞繆爾·斯邁爾斯的《西國立志篇》，熱賣 100 萬冊以上，成為與福澤諭吉的《勸學篇》比肩的暢銷書。明治 5 年（1872）任職大藏省，明治 14 年（1881）任東京大學教授，明治 19 年（1893）年成為元老院議員。

信夫粲，號恕軒，父親是鳥取藩江戶府邸的醫生，他兩歲時父親去世。在貧苦的生活中，先後跟隨海保漁村、芳野金陵、大槻磬溪學習，後在江戶本所開設奇文欣賞塾，教授《易經》《詩經》《左氏傳》和《史記》。明治 8 年到東京師範學校教授漢文，明治 10 年至 19 年在東京大學教授漢文。

在東京大學，明治 15 年（1882），法學部開始允許使用日語和漢文撰寫畢業論文，16 年（1883）又決定將授課用語由英語轉換為日語。就這樣，隨著赴歐美留學人員不斷回國，教師隊伍逐漸以日本人為主，學校的教學用語也從西語變為國語。

明治 18 年（1885），漢文學科分離為和文學科與漢文學科。當時的漢文學科有教授中村正直（漢文學、支那哲學）、三島毅（漢文學）、島田重禮（漢文學、支那哲學）、南摩綱紀（漢文學）、川田剛、重野安繹，另有副教授井上哲次郎（東洋哲學史）、講師信夫粲（漢文學）、內藤恥叟（漢文學）、准講師丹羽忠道（漢文學）、古屋矯（漢文學）。據說，中村所以成為教師的核心，是由於他通曉西學，英文、西洋哲學、西洋史專業的學生選修其授課時，中村會讓學生們把平時學的英文文章翻譯成漢文，取得了很好的學習效果。三島毅曾慨嘆當時的學生其他課目太多，努力學好漢文的人很少。在西學盛行的社會風潮中，報考和漢文學科的學生極少。為了阻止傳統

學術的衰退，明治 15 年，設立了「古典講習科」，屬於臨時性的國學修業課程，第二年，又設立了「古典講習科乙部」，招收 40 名學生，專門學習漢籍古典。後來由於預算的原因，只招收了一屆，前期 27 人後期 16 人畢業，湧現出了林泰助、市村瓚次郎、瀧川龜太郎、兒島獻吉郎、長尾雨山等優秀學者，在中國古典學研究方面取得大量成果。

明治 19 年 3 月 1 日，根據〈帝國大學令〉，東京大學變成帝國大學。東京大學文學部也改為帝國大學文科大学，下設哲學科、和文學科、博言學科和漢文學科。明治 22 年 6 月，增設國史科，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分別改稱國文學科和漢學科。本年起，開始進行現代漢語教育，聘請張滋昉任課。明治 26 年，開始實施講座制，在漢學科，第一講座=教授島田重禮、第二講座=教授竹添進一郎、第三講座=講師張滋昉。到明治 37 年，各講座的陣容陸續有所變化，第一講座的教授繼島田重禮之後的是重野安繹和星野恆，第二講座教授為竹添進一郎、根本通明（講師，29 年開始任教授），第三講座在張滋昉講師之後是宮島大八。

島田重禮(1838-1898)，號篁村，生於大崎的一個富裕農家，後至江戶，先後跟隨海保漁村(1798-1866)和安積良齋(1791-1860)學習朱子學。後因良齋去世，便回到家鄉繼續自學。26 歲入昌平坂學問所學習，得到鹽谷宕陰(1809-1867)的賞識，慶應元年(1865)成為學問所助教。明治維新後，在東京開設私塾——雙桂精舍，麾下聚集了眾多學生。明治 7 年，任教於東京師範學校，明治 8 年，竹添進一郎前往中國，作為他的後任，島田重禮赴任太政官修史局，明治 12 年，任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講師。島田重禮遍曉中國古典，精通三禮之學，最早將清朝考證學導入經學研究中。其學風以弟子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為紐帶，由東京和京都兩帝國大學所繼承。

重野安繹和星野恆均從事國史編纂，在日本史實證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由此可見，培養具有漢籍讀解能力和漢文作文能力、以繼承日本傳統學術的人才，是當時漢學科的教育目標。

明治 37 年(1904)，文科大学變成由哲學、史學、文學三個學科構成的新體制，原漢學科分解為支那哲學和支那文學兩個專業，分別隸屬哲學科及文學科，到大正 8 年(1919)，又各自成為支那哲學科和支那文學科。昭和 7 年(1932)，文學部進行改組，上述兩個學科合併為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科，昭和 23 年，再次分為中國哲學科和中國文學科。在帝國大學時期，中國文學作為獨立的專業而存在的時間約為 14 年。

## 二、京都帝國大學的創立

早在明治 12 年，便有人提議在關西建立第二所帝國大學，到了明治 25 年，曾經嚴厲批判帝國大學成本過高的長谷川泰向議會提交了〈在關西設立帝國大學的建議案〉，認為沒有競爭對手的大學勢必要衰退。不過，直到日清戰爭（明治 27-28，1894-1895）以後，設立新大學的動向才算真正開始。<sup>3</sup>時任文部大臣的西園寺公望認為戰後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擴充高等教育，並命令次官牧野伸顯組織研究。牧野提出，歐洲各國都在努力發展科學專業教育，日本有必要從日清戰爭賠款中拿出一部分來作為經費，以第三高等學校為基礎建立京都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的設立始於明治 30 年（1893）6 月，先是在第三高等學校工業部的基礎上設立了理工科大學，但其後續的擴充發展面臨幾多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在於，建立教員隊伍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費用。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除了從最早建立的東京帝國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引入人才以外，從明治 29 年開始，派遣大量留學生赴歐美留學。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隊伍主要由這些留學歸國者所組成。不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均為（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京都帝國大學基本上脫胎於（東京）帝國大學。

說到京都帝國大學的特徵，它原本是作為東京帝國大學的競爭對手而設立的，當時那個時代與今天不同，東京和京都在地理上相距遙遠，這成為各自具有獨特性的基礎；東京是明治維新後的新首都和文明開化的中心，而京都則是日本的千年古都和傳統文化的中心，如此等等。當時有人預測，在京都帝國大學中，其文科大學將來必定會大放異彩。

明治 30 年，京都帝國大學設置敕令發布，規定京都帝國大學由法、醫、文、理四個分科大學構成，同一年理工科大學最先設立，兩年後法科大學、醫科大學也建立起來，唯有文科大學，由於日俄戰爭（明治 37-38 年，

<sup>3</sup> 有關京都帝國大學的情況，均據以下文獻：天野郁夫 AMANO Ikuo：《大學の誕生 帝國大學の時代》*Daigaku no tanjō Teikoku daigaku no jidai* 上·下（東京[Tokyo]：中央公論社[Chūō kōron sha]，2009 年、京都大學文學部 Kyoto daigaku bun'gakubu：《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Kyoto daigaku bun'gakubu gojūnen shi*（京都[Kyoto]：京都大學文學部[Kyoto daigaku bungakubu]，1956 年）、京都大學百年史編輯委員會 Kyoto daigaku hyakunen shi henshū iinkai：《京都大學百年史 部局史編一》*Kyoto daigaku hyakunen shi bukyoku shi ichi*（京都[Kyoto]：京都大學後援會[Kyoto daigaku kōenkai]，1997 年）。

1904-1905)爆發，延遲了設立時間。直到明治39年9月，文科大學成立，先由哲學科開始，40年9月，史學科成立，41年9月，文學科也開始運行。

### 三、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文學科支那語學支那文學講座

明治39年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成立之初，便設置了支那語學支那文學講座，由狩野直喜任擔當教授。<sup>4</sup>不過，在同時設置的六個講座中，有五個屬於哲學科，只有這一個屬於文學科。故頭兩年支那語學支那文學專業未能招收學生，狩野直喜教授也只能在哲學科教授支那哲學史方面的科目。

狩野直喜(君山)，明治元年(1868)出生於熊本，恰好是和日本近代同行的人物。<sup>5</sup>明治12年12月，進入熊本的私立學校「同心學舍」，明治15年被編入「同心學舍」的後身——縣立濟濟齋，明治17年畢業。「同心學舍」繼承了熊本藩藩校「時習館」的儒教教育傳統，主張武士道精神和皇室中心主義，與文明開化風潮中誕生的官立學校所進行的西洋式教育頗有不同。從濟濟齋畢業後，狩野前往東京，進入神田共立學校(在學期間改稱東京開成學校)學習英語。明治19年(1893)考入第一高等學校，明治25年(1899)，進入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當時的漢學科的教授有島田重禮、竹添進一郎和根本通明，狩野師事島田重禮，學習清朝考證學。

狩野直喜其實正是帝國大學想要培養的那類人材。帝國大學的使命，是培養日本近代化所需要的既精通歐美語言又掌握歐美文化科學技術的人才。但唯獨文科大學的國學科漢學科有所不同。它要培養的人才除了通曉歐美語言、掌握歐美文化學術之外，還須精通日本的傳統文化。因此，漢學科的學生既要學習歐美語言，又必須具備江戶時代以來的中國學的傳統素養。在江

<sup>4</sup> 據京都大學文學部 Kyoto daigaku bungakubu:《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Kyoto daigaku bun'gakubu gojūnen shi*(京都[Kyoto]:京都大學文學部[Kyoto daigaku bungakubu],1956年)、京都大學百年史編輯委員會 Kyoto daigaku hyakunen shi henshu iinkai:《京都大學百年史 部局史編一》*Kyoto daigaku hyakunen shi Bukyokushihen ichi*(京都[Kyoto]:京都大學後援會[Kyoto daigaku koenkai],1997年)。

<sup>5</sup> 據京都大學文學部 Kyoto daigaku bungakubu:《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Kyoto daigaku bungakubu gojūnen shi*(京都[Kyoto]:京都大學文學部[Kyoto daigaku bungakubu],1956年)、狩野直禎 KANÔ Naosada:〈狩野直喜〉“KANÔ Naoki”收入江上波夫 EGAMI Namio 編:《東洋學の系譜》*Tōyōgaku no keifu*(東京[Tokyo]:大修館書店[Taishūkan shoten],1992年),頁98-107、高田時雄 TAKATA Tokio:〈狩野直喜〉“KANÔ Naoki”,收入礪波護 TONAMI Mamoru、藤井讓治 FUJII Jōji 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Kyodai toyogaku no hyakunen*(京都[Kyoto]: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Kyoto daigaku gakujutsu shuppankai],2002年),頁4-36。

戶時代，所謂傳統教養，主要體現在武士階級身上，以基於朱子學的四書五經的知識和漢詩文寫作能力為核心。關於四書五經及其他中國典籍，主要通過訓讀的方法，將之日語化來閱讀。這些素養從小時候就通過「素讀」（用訓讀方法將中國古文作為日語出聲閱讀的方法）方法加以培養，通過背誦四書五經，使朱子學成為人的內在修養。狩野直喜自幼喪父，由祖父直溫養育。直溫曾是藩學時習館的「句讀師」（教師），故可以推斷狩野直喜一定從祖父那裡接受過「素讀」教育。故狩野直喜一方面具備傳統的日本漢學修養、長於漢詩文創作、懂得現代漢語、熟知較新的學問——清朝考證學；另一方面，他又畢業於帝國大學，精通英語等歐美語言和西洋學術文化，屬於學貫東西的通才。

明治 28 年（1895），狩野從帝國大學畢業，那一年也是日清（甲午）戰爭結束的年頭。正如美國的歷史學者沃倫·金鮑爾所說：「在日本和中國之間，圍繞誰來掌控兩國之間的均衡這一問題，雙方在文化、社會、經濟以及『理性智慧的領域』都展開了漫長的競爭。」<sup>6</sup>有人認為，在亞洲近代歷史中，日本和中國在文化、經濟、社會和思想領域裡一直在不斷地爭奪主導地位。學問研究這種理性智慧領域也同樣無法獨立於近代歷史的這一格局。眾所周知，以日清戰爭為契機，明治日本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由於日清戰爭具有英國和俄國的代理戰爭這一特點，英國向日本做了讓步。明治 27 年，日清戰爭開戰，同年 7 月，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簽訂，規定廢除英國在日本的領事裁判權、恢復關稅自主權。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夙願終於得到實現。不僅如此，日清戰爭的勝利使日本從中國獲得了兩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約合三億兩千萬日元，等於日本三年的國家預算。這筆巨大的賠款使得原本因為戰爭費用而緊張的國家財政狀況大為好轉，賠款的六成被用於對俄國的軍備擴張上。尤其是，直到江戶時代，對日本來說，中國一直是自己畏懼的經濟和文化大國。但日清戰爭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日本開始產生「亞洲盟主」的意識。設立第二所帝國大學計劃的真正實施便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也就是明治 30 年京都帝國大學理工科大學的成立。在這個背景下，狩野直喜受政府派遣，赴中國（清朝）留學，條件是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建立後前去擔任教授。政府期待在亞洲研究和中國研究的學術領域裡，日本

<sup>6</sup> 加藤陽子 KATÔ Yôko:《それでも、日本人は「戦争」を選んだ》*Soredemo, Nipponjin wa 'sensô' wo eranda* (東京[Tokyo]:朝日出版社[Asahi shuppansha], 2009 年), 頁 84。

也能夠發揮主導作用。狩野於明治 33 年 4 月離開日本前往北京，6 月義和團運動爆發，北京城被圍困，8 月，隨著八國聯軍入城，圍困被解除後，狩野回到日本。第二年，重新被派到上海留學兩年。留學期間，狩野多次到位於上海的「王立亞洲協會中國支部」（通稱「亞洲文會」，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圖書館訪書，廣泛涉獵歐洲的東洋學研究著作，與住在上海的歐美學者進行交流。歐洲東洋學研究的新的方法及其對新的領域的開拓，引起了狩野的興趣。

明治 36 年 4 月，狩野結束留學回到日本。但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尚未成立，於是他便參加由臺灣總督府組織的《清國行政法》編纂工作，內容是調查臺灣的舊習慣。這項活動屬於日本殖民地統治的一部分，從明治 33 年（1900）、也就是臺灣成為殖民地後的第五個年頭開始，一直進行到大正 11 年（1922），其目的自然是為了更好地對殖民地實施統治。<sup>7</sup>為此，統治當局對殖民地之前已持續了 200 多年的中國法律以及臺灣當地的法律習慣等展開調查，並在近代法律體系之下，將之定位於「舊的習慣」。這項調查的最大成果就是《清國行政法》一書。通過赴中國留學、特別是編纂《清國行政法》，狩野對現實中國社會的理解有了極大飛躍。沒有這一段經歷，即沒有他後年的大著《清朝的文學與制度》。近代的知識學術同時也具一種權力，殖民地統治同時包含著通過知識學術完成殖民地自身的再構成。日本所進行的臺灣、滿洲、華北農村「舊習慣」調查都是試圖通過近代知識學術重新建立各地的制度體系。建立近代法律制度，是所有近代以來在歐洲列強的軍事力量逼迫下被迫開放門戶的國家無法躲避的重要問題，也是在知識學術領域中圍繞「亞洲的盟主」展開的競爭的一部分。

明治 20 年代後半到 30 年代之間，冠名「支那文學史」的著作陸續出版。<sup>8</sup>兒島獻吉郎的《支那文學史》（明治 24-15 年〔1891-1892〕，同文社）算是濫觴之作，而其他全都出版於日清戰爭之後，並且均可從中窺見「亞洲盟主」意識。

<sup>7</sup> 石田真 ISHIDA Makoto：〈戦前の慣行調査が「法整備支援」に問いかけるもの〉“Senzen no kanko chô sa ga ‘Ho seibi shien’ni toikakeru mono”，收入早稻田大學比較法研究所 Waseda daigaku hikaku hougaku kenkyûjo 編：《比較法研究の新段階：法の継受と移植の理論》Hikaku hô kenkyu no sin dankai :hō no keiju to ishoku no riron（2003 年），頁 93-115。

<sup>8</sup> 和田英信 WADA Hidenobu：〈明治時期刊行の中國文學史〉“Meiji ki kankô no Chû goku bungaku shi”，收入川合康三 KAWAI Kôzô 編：《中國の文學史觀》Chûgoku no bungaku shikan（東京[Tokyo]：創文社[Sô bun sha]，2002 年），頁 157-179。

正如和田英信所指出的那樣，大多數《支那文學史》的作者都出自帝國大學及其附屬古典講習科。<sup>9</sup>編寫文學史是來自歐洲的最新學術動向，始於法國泰納的《英國文學史》（1864）。<sup>10</sup>日本的第一本文學史是三上參次和高津桑三郎的《日本文學史》（明治23年（1890）），這本書既是國民國家建設事業的一部分，也是近代知識和學術對過去的再構成。《支那文學史》既是外國文學史，又是日本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明治之後，武士階級不再存在，具有高度學術性的政治及思想語言基本都依賴於中國古典文化。隨著新的教育制度的建立，識字階層逐漸擴大，但作為傳統文化的中國古典的教養並未喪失。在各種各樣的教育中，以往的教養在不斷經歷著再生產的過程，《支那文學史》便是其中一部分。

在近代化過程中，中國古典文化這一知識學術領域的劃分也必然發生變化。所謂文學，即文之學，原本是一個涵蓋古典教養的概念，頻頻出現在明治時代的中國文學史中。在明治初期的中國文學史中，經書、先秦諸子、詩文，即呈現為思想著作和詩文作品共存的狀態。對於繼承了江戶以來的古典教養的明治文化人來說，這絲毫不奇怪。但隨著西洋化近代化的展開，其第一個階段就是文學（文之學）分化為哲學（philosophy）和文學（literature）；到了第二階段，在西洋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戲曲和小說成為文學研究的對象，在中國文學史中登場。而這些又與學校制度和大學制度的建立平行前進。

明治39年（1906）文科大學建成，狩野作為教授前往赴任。但第一年只有哲學科招收學生，狩野只能在哲學科教授了兩年支那哲學史。明治41年（1908）以後，又開設了支那語學支那文學課，其中有一般科目〈支那哲學史〉〈支那文學史〉；還有特殊科目〈清朝學術〉、〈論語研究〉、〈清朝經學〉、〈公羊研究〉、〈左傳研究〉、〈孟子研究〉、〈支那小說史〉、〈支那戲曲史〉、〈清朝文學〉、〈清朝的制度和文學〉、〈兩漢學術考〉、〈魏晉學術考〉等<sup>11</sup>。作為具備江戶以來的古典教養的人物，狩野自身恰好遭逢大

<sup>9</sup> 同上註。

<sup>10</sup> 連塔理卡·馬克羅林 Frank Lentricchia 著，Thomas McLaughlin 編：《現代批評理論——22の基本概念》*Gendai hihyō riron—22 no kihon gainen*（東京[Tokyo]：平凡社[Heibon sha]，1994年），頁525-551。

<sup>11</sup> 〈狩野教授著作年表〉“Kanō kyōju chosaku nenpyō”，《狩野教授還曆紀念支那學論叢》*Kanō kyōju kanreki kinen shinagaku ronsō*（1928年）卷頭。

學制度中哲學與文學的分化，他一方面兼備兩方面的素養，同時又在歷史的框架中分別講過哲學和文學。

狩野又是一位在敦煌學草創期頗為活躍的學者。<sup>12</sup>所謂敦煌文書，是指從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多達數萬件的公元十世紀之前的手寫經卷文書。一般認為在1900年左右最早發現敦煌文書的，是當地的一位道士王圓籙。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來到敦煌，將數千件敦煌文書帶回大英博物館。1908年，法國的伯希和也來到敦煌，將數千卷敦煌文書運到法國。1909年9月，伯希和受河內遠東學院派遣訪問北京時，在歡迎會上展示了部分敦煌文書。至此，中國和日本才知道敦煌文書的存在。遠在千年以前的古寫本的大量發現，給了中國以及日本研究者巨大衝擊。在京都，有人請北京的羅振玉寄來敦煌文書的照片，在1909年10月舉行的史學研究大會（京都府圖書館）上進行展覽，並由文科大學的職員進行講解。1910年，當得知殘存的敦煌文書已運到北京的消息後，文科大學馬上派遣狩野等5名教授前去北京調查。不過那時能看到的僅限於一少部分佛典。後來，狩野從明治45年9月開始，用一年時間赴歐洲留學，途中，在巴黎和倫敦，他得到夏潘努和伯希和的幫助，得以對敦煌文書進行調查，回國後發表了經學研究論文〈唐鈔古本尚書釋文考〉。

近代的所謂探險活動，與歐洲列強對世界各國的領土瓜分以及殖民地統治密不可分。19世紀末，在世界主要地區的殖民地爭奪已告結束，僅有歐亞大陸中部屬於空白。在這種情況下，在歐洲各國急速掀起了中亞探險熱，並且各個探險隊都得到所在國家的支持。俄國、英國、法國、德國的中亞探險背後無不隱藏著近代國家的殖民地慾望。斯坦因、伯希和發現敦煌文書既有純粹的學術意義，也顯示了近代國家的殖民地慾望。同樣，在敦煌學的領域裡，日本的帝國大學也不甘落後，要與歐洲列強為伍，在知識學術領域中發揚國威。特別是作為剛剛成立的京都帝國大學的教師，需要有新的學術成果，因此必然設法介入這一領域的工作。學術研究的興衰往往反映著社會的慾望。帝國的大學也無法擺脫帝國的慾望。

在日本，笹川種郎（臨風）的《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東京：東華堂，明治30年（1897）），是最早把小說戲曲這些所謂俗文學納入中國文學史敘述中的。這本書論及《水滸傳》、《三國志》、《西廂記》、《琵琶記》、《西

<sup>12</sup> 高田時雄 TAKATA Tokio：〈狩野直喜〉“KANÔ Naoki，收入磯波護 TONAMI Mamoru、藤井讓治 FUJII Jôji 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Kyôdai tôyôgaku no hyakunen*（京都[Kyoto]：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Kyoto daigaku gakujutsu shuppankai]，2002年），頁4-36。

游記》、《紅樓夢》、《桃花扇》，也談到湯若士、金聖嘆和李笠翁<sup>13</sup>。笹川種郎的另一本《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明治31年（1897））更是將小說戲曲與詩文共同作為文學史的對象加以論述。笹川種郎於明治29年（1896）畢業於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國史科，第二年即28歲時，撰寫了《支那小說戲曲小史》。然而，在日清戰爭之後，國家主義思潮高漲，《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受到國民文學派的嚴厲批判。這一派以國民國家這一形態為前提，否定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在新時代的價值，認為「支那文學的思想對我國國民文學的進步並無裨益。除開歷史意義，其價值不值稱道。我國學者對支那文學的研究只能是純粹歷史意義上的研究。」<sup>14</sup>就這樣，中國古典小說戲曲的地位，由日本知識分子的共同遺產和基礎教養轉變為帝國大學教授們所進行的歷史性實證主義研究對象。

利用敦煌文書，對戲曲小說等中國俗文學的初期歷史進行實證研究，始於狩野和王國維。<sup>15</sup>1911年12月，為了躲避辛亥革命的混亂，王國維（1877-1927）和羅振玉訪問日本，在京都滯留了五年。1912年，羅振玉的藏書被運到京都，寄存在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這樣，兩位著名的清朝學者及其藏書到了京都，成為一個重大事件，對草創不久的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學產生了巨大影響。王國維，具有深厚的古典學術教養，通曉歐美語言，並且從近代立場對中國的文化遺產進行重新研究和評價，在這些方面他和狩野之間有不少相通之處。王國維看過狩野從歐洲帶回來的敦煌文書的照片，並撰寫了若干跋文，表現出對敦煌文書中唐代小說的興趣。1913年1月，來到日本一年以後，王國維完成了《宋元戲曲考》。在中國古典學術中未能得到應有評價的戲曲和小說領域中，王國維和狩野都做出了貢獻。狩野在這方面的論文收錄在《支那學文藪》（弘文堂，1927年，增補版見みすず書房，1973年）。在狩野的《中國小說史》和《中國戲曲史》等講義錄中可以看到，他

<sup>13</sup> 西上勝 NISHIGAMI Masaru：〈人情の探究と小説史の構築—笹川種郎著『支那小説戲曲小史』をめぐって—〉“Ninjô no tankyû to shôsetsu shi no kôchiku ——SASAGAWA Taneo cho ‘Shina shôsetsu gikyoku shôshi’ wo megutte”，收入川合康三 KAWAI Kôzô 編：《中國の文學史觀》*Chûgoku no bungaku shikan*（東京[Tokyo]：創文社[Sôbun sha]，2002年），頁225-255。以下有關笹川種郎著作之所述，均據此文。

<sup>14</sup> 高山樗牛 TAKAYAMA Chogyû：〈支那文學の價值〉“Shina bungaku no kachi”，《太陽》*Taiyô* 明治30年9月號。

<sup>15</sup> 參見高田論文。

很好地吸收了歐洲中國學的成果，試圖用接受了歐洲學術影響的近代知識體系重新構築中國學。從明治 43 年（1910）開始，狩野每年開設元曲講讀課，直到 100 年後的今天，京都大學的元曲研究依然十分興盛，湧現了許多元曲研究專家。

狩野 1900 年在北京遭遇的義和團事件的善後處理，以 1901 年〈關於北清事變的最終議定書〉（辛丑條約）的簽訂宣告結束。議定書內容由列國協議決定，首都北京已被八國聯軍占領的清朝政府除了同意以外沒有其他選擇。條約規定中國向八國支付賠款 4 億 5 千萬兩白銀，將近清朝年間預算的 5 倍。龐大的賠款既阻礙了清朝實行開明政策，也導致了清朝滅亡後中華民國政府的衰弱。賠款一直支付到 1938 年，共支付 6 億 5 千萬兩白銀。

大正 12 年（1923），日本制定了基於義和團賠款的「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並成立了顧問機構「對支文化事業調查會」，東京帝國大學的服部宇之吉和京都帝國大學的狩野擔任了委員。當時，狩野在意見書中提出「在支那建設文化設施不能光是考慮兩國間的直接利益。不能把這一事業建立在消除支那的排日感情的基礎上」，反對將文化事業政治化。大正 14 年（1925）具體實施日中共同事業的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成立，決定柯劭忞任委員長、在北京設立人文科學研究所、繼續編修四庫全書等事項。但到了昭和 3 年（1928），由於濟南事件的發生，中國國內反日運動高漲，委員會中方委員辭職，於是這一事業只得由日方單獨運營。昭和 4 年（1929），北京的事業運營陷入困境，委員會決定在日本設立研究機構，於是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及京都研究所分別成立。京都研究所就是後來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昭和 3 年（1928），狩野從京都帝國大學退休後，擔任東方文化學院的理事和京都研究所主任（所長）。昭和 12 年（1937）日中戰爭爆發，軍部要求東方文化學院進行有關對華政策的研究。後來外務省又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即在東方文化學院既有的研究之外進行有助於制定政策的研究。這個方案取得了東京所的同意，但卻遭到京都研究所的拒絕。昭和 13 年（1938）京都研究所從東方文化學院分離出來，改稱東方文化研究所，狩野辭去所長職務。

對京都的中國學研究而言，東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具有極大意義。昭和 4 年（1929）研究所成立初期，從天津的著名藏書家陶湘（1871-1940）那裡購入書籍 17939 冊，奠定了研究所藏書的基礎。這批書以叢書為主，基本包含了中國各個時期各個地域的主要書籍，為中國學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

礎<sup>16</sup>。以此為基礎，搜集清朝考證學研究成果的方針得以確立。這也可以理解為在「知識學術」領域中的主導權之爭。在近代人文科學研究的展開過程中，依賴書刊、信息積累的傾向很強。書刊是知識學術這一權力的源泉之一。日本是中國的近鄰，自古便從中國輸入了很多書籍。但往往有存在偏向。東方文化學院的書籍收集活動體現了糾正偏向、把握中國文化整體的慾望，算是圍繞知識學術主導權的一種活動。

狩野直喜生前出版的著作僅有《支那學文藪》和《讀書纂余》（弘文堂，1947年）兩種。但他去世後，所遺留的筆記由後人整理出來，先後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岩波書店，1953年）、《兩漢學術考》（筑摩書房，1964年）、《魏晉學術考》（筑摩書房，1968年）、《支那文學史》（みすず書房，1970年）、《論語孟子研究》（みすず書房，1977年）、《漢文研究法》（みすず書房，1979年）、《御進講錄》（みすず書房，1988年）、《清朝的制度與文學》（みすず書房，1984年）、《支那小說戲曲史》（みすず書房，1992年）、《春秋研究》（みすず書房，1994年）。

明治42年（1909），鈴木虎雄赴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文學科支那哲學文學講座任副教授，他是狩野直喜挑選的人才。鈴木虎雄（1878-1963），明治11年出生於新瀉縣<sup>17</sup>。祖父和父親均為漢學者，開設私塾從事教育活動，鈴木虎雄的中國古典教養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自幼養成的。十幾歲時他來到東京，先後在東京府尋常中學、第一高等學校、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學習。畢業後，在日本新聞社和臺灣日日新聞社任職，後經東京師範學校教授來京都帝國大學任教，昭和13年（1938）退休。鈴木最有名的成果，是杜甫全詩1400首的譯註《杜少陵詩集》（續國譯漢文大成，東京：國民文庫刊行會，1928-1931年）。據詩集跋文所敘，詩集以《杜詩詳註》為底本，昭和3年4月16日將第一卷初稿郵寄給出版社，昭和6年9月24日便最終完成譯註原稿，期間還有半年前往歐洲考察。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完成如此詳盡

<sup>16</sup> 高田時雄 TAKATA Tokio:《陶湘叢書購入關聯資料》*Tôshô sôsho kônyû kanren shiryô* (京都[Kyoto]: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東亞人文情報學研究中心[Kyoto daigaku jinbun kagaku kenkyûsho fuzoku Higashi ajia jinbun jôhōgaku center], 2010年), 頁1-127。

<sup>17</sup> 以下均參見京都大學文學部 Kyoto daigaku bungakubu:《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Kyoto daigaku bungakubu gojû nen shi* (京都[Kyoto]: 京都大學文學部 Kyoto daigaku bungakubu, 1956年)、興膳宏 KÔZEN Hiroshi:〈鈴木虎雄〉“SUZUKI Torao”收入江上波夫 EGAMI Namio 編:《東洋學の系譜》*Tôyōgaku no keifu* (東京[Tokyo]: 大修館書店[Taishû kan shoten], 1992年), 頁194-203。

精確的註釋和翻譯，令人詫異不止。鈴木的譯詩排斥對原詩的肆意解釋，在精細考證的基礎上完成的譯文平實易懂，雖有古式風貌，但即使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除此之外，鈴木還有如下譯著，《白樂天詩解》（弘文堂，1927年）、《禹域戰亂詩解》（弘文堂，1945年）、《陶淵明詩解》（弘文堂，1948年）、《陸放翁詩解》上中下（弘文堂，1950-1954年）、《玉臺新詠集》上中下（岩波書店，1953-1956）、《李長吉歌詩集》（岩波書店，1961年）等。鈴木在《陸放翁詩解》序言中指出，「不去理解其他國家的文學，就無法將其長處植入自己國家的文學中。我國是支那大陸的近鄰，而全然不知其文學的長處，那不是愚蠢之極嗎。」顯然，鈴木已經意識到，中國古典文學已經不單是日本知識分子的文化背景，而屬於外國文學的範疇，是一種逐步喪失的「知識」。世界文學這一概念無法與翻譯行為相割裂。<sup>18</sup>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的文學，要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就必須翻譯成其他語言。中國古典文學也同樣，經過現代日語的翻譯，而並非江戶以來的訓讀，它成為日本的世界文學。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中國古典文學被陸續翻譯成現代日語，這顯示了中國古典文學在日本社會所處位置的變化，那就是，中國古典文學成為了外國文學、成為了世界文學。

鈴木也是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先驅者。在教學方面，他先後開設了特殊科目〈支那詩論史〉（明治44年（1911））、〈唐宋詩說史〉（昭和3-4年（1928-1929））和〈宋元詩說史〉（昭和5年（1930））；在著作方面有《支那詩論史》（弘文堂，1925年）。這本書出版後不久被譯為中文，以《中國古代文藝史論》上下（孫俚工譯，上海：北新書局，1928-1929年）的書名出版。中國第一部中國文學理論史著作《中國文學批評史》（陳鐘凡著，上海：中華書局，1927年）的參考書目中也列有此書，顯示了其在此領域的先驅意義。之後，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人文書店，1934年）等同類著作陸續出版，在現代，這方面的研究也很興盛。但無論如何，作為這一領域的最早先驅，鈴木應該得到充分的評價。此外，鈴木還著有《支那文學研究》（弘文堂，1925年）、《業間錄》（弘文堂，1928年）、《賦史大要》（富山房，1936年）、《駢文史序說》（京都大

<sup>18</sup> 大衛·戴姆勞什 David Damrosch:《世界文學とは何か?》*Sekai bubgaku towa nanika?*(東京[Tokyo]: 國書刊行會[Kokusho kankōkai], 2011年), 頁227-319。

學文學部研究室，1961年，研文出版，2007年）<sup>19</sup>。而鈴木的詩論研究，則為他的學生青木正兒所繼承。

鈴木虎雄教授退休後，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文學科支那哲學文學講座第一屆畢業生青木正兒前來擔任教授。青木正兒（1887-1964）出生於山口縣下關市的一個醫生家庭，在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畢業後，於明治41年（1908）9月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文學科，成為支那哲學文學講座的第一屆學生<sup>20</sup>。據說他所以選擇學習中國文學，是由於受到喜愛漢學及中國書畫的家風的影響。大學時代，他師事於狩野直喜和鈴木虎雄，畢業論文做的是《元曲研究》。從明治44年（1911）大學畢業到大正13年（1924）赴東北帝國大學任教之前，他一直在京都過著自由人的生活。這一時期，他和本田成之、小島祐馬等創辦了雜誌《支那學》。當時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学的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湖南）建立了一個綜合了哲學史學文學的中國研究學會「支那學會」，而《支那學》雜誌就是用來發表學會的研究成果。當時京都中國學的著名學者，如狩野、內藤、神田喜一郎、鈴木虎雄、武田義雄等，都為雜誌投過稿。雜誌在大正9年（1920）9月創刊，一直持續到昭和22年（1947）8月。雜誌的宗旨是打破江戶以來的漢學格局，同時與歐洲的中國學一比高低。青木對中國的新動向極為敏感，最早在雜誌上介紹「文學革命」，對當時還是無名新人的魯迅給予高度評價。這一時期，青木組織了「麗澤社」，跟隨狩野直喜學習漢文創作；還成立了畫會「考槃社」，進行南畫鑒

<sup>19</sup> 狩野直喜著有漢詩集《君山詩艸》*Kunzan shisô*（1960），在他去世後，由吉川幸次郎編輯出版。作為漢詩詩人，鈴木虎雄遠遠超越了他的恩師。1938年，為紀念鈴木從京都大學退休，「鈴木教授還歷紀念會」編輯出版了多達14卷的《豹軒詩抄》*Hyôken shishô*（京都[Kyoto]: 弘文堂[Kôbundo]，1938年）輯錄了作者自10歲開始創作的1500餘首漢詩，但僅僅是其詩稿的一半。到了晚年的1959年，鈴木教授的第二部詩集《豹軒退休集》*Hyôken taikyûshû*（鈴木先生喜壽紀念會編 Suzuki sensei kiju kinenkai hen，京都[Kyoto]: 弘文堂[Kôbundô]，1959年）17卷出版，收錄漢詩逾7000首。鈴木所敬愛的宋代詩人陸游一生作詩達萬首以上，以數量而言，鈴木幾乎可以比肩陸游。第二部詩集中的漢詩創作，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近前，恰好遭逢了充滿動蕩巨變的時代。作者那猶如日記一般、持續不斷的詩作，記錄抒寫了一個時代的生活和世態。

<sup>20</sup> 以下均參見京都大學文學部 Kyoto daigaku bun'gakubu:《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Kyoto daigaku bun'gakubu gojû nen shi*（京都[Kyoto]: 京都大學文學部[Kyoto daigaku bun'gakubu]，1956年）、水谷真成 MIZUTANI Shinjô:〈青木正兒〉“AOKI Masaru”，收入江上波夫 EGAMI Namio 編:《東洋學の系譜》*Tôyôgaku no keifu*（東京[Tokyo]: 大修館書店[Taishûkan shoten]，1992），頁262-270。青木正兒的著作可見《青木正兒全集》*AOKI Masaru zenshû* 10卷（東京[Tokyo]: 春秋社[Shunjû sha]，1969-1975年）。

賞和創作。大正 13 年(1924)，青木赴東北帝國大學任教，大正 14 年(1925) 3 月到次年 7 月，前往中國留學。昭和 13 年(1938)作為狩野直喜的後任來到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学任教，昭和 22 年(1947)退休，昭和 25(1950)到昭和 32 年(1957)在山口大學任教。再後，擔任立命館大學特任教授。

關於青木所取得的業績，正像他的第一本著作《金冬心之藝術》(京都：匯文堂，1920 年)所體現出來那樣，就是從囊括詩文書畫及音樂等所有藝術領域的文藝這一觀點出發，對中國的文學藝術進行研究。他的《支那文藝論叢》(弘文堂，1927 年)便充分顯示了其廣闊的研究視野。

另外，青木的博士學位論文《支那近世戲曲史》(弘文堂，1930 年)是繼狩野直喜和王國維之後的又一部戲曲研究著作。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出版之後，還剩下明清時代的戲曲史這一研究空白。青木的論文以此為研究對象，進行了詳細而周密的調查整理和研究。對於此書，1933 年，上海北新書局出版了鄭震的節譯本；1935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則刊出王古魯的全譯本，到 1954 年又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增補修訂本。該書運用近代知識學術，探討一個尚未開拓的研究領域。而青木本人對這一方法論問題抱有明確的認識：「以往我國的支那學者所展開的研究路徑有兩種，即新的體系方法和探討尚未開拓的領域。就文學而言，採用新的體系屬於文學史的研究方法；而對新領域的開拓則提高了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的地位。」<sup>21</sup>青木另有《元人雜劇序說》(弘文堂，1937 年)。

在文學理論研究領域，青木的《支那文學思想史》(岩波書店，1943 年)是繼鈴木虎雄《支那詩論史》以後的重要成果。青木認為，《支那詩論史》由三部分構成，第一編為周漢諸家的詩論，第二編是魏晉南北朝時代的詩論，第三編論及格調·神韻·性靈的三詩說。全書主要選取中國文學思想的精華部分，唐宋時代的詩論僅為梗概，除魏晉南北朝之外，所論限於詩學思想。為了彌補這些不足，《支那文學思想史》以通時的視角，對各個時代進行考察，全面敘述了中國文學思想。在書的外編，還收錄了有關書畫音樂等藝術思想的概說。除《支那文學思想史》之外，《清代文學評論史》(岩波書店，1950 年)也是一部很重要的書。由於《支那文學思想史》對清代的文學思想變遷所述不夠詳盡，故作者在該書中旁徵博引，進行了清楚的描述。

<sup>21</sup> 青木正兒 AOKI Masaru:〈支那文學研究に於ける邦人の立場〉“Shina bungaku kenkyu ni okeru hojin no tachiba”，《東京帝大新聞》Tokyo teidai shinbun (昭和 12 年 6 月)。收入青木全集第 7 卷中的《江南春》Konan no haru，頁 45-48。

說到青木，就必然要涉及到「漢文直讀論」。陶德民曾在研究中考察了「漢文直讀論」與當時的政治形勢的關係。<sup>22</sup>大正9年（1920）10月，青木在《支那學》第1卷第5號發表了〈本邦支那學革新的第一步〉一文，<sup>23</sup>提出在學習中國古文時，應當用現代漢語來發音，而不應依賴訓讀。<sup>24</sup>訓讀是一種把漢語作為日語進行閱讀的方法。它給中國古文加上符號，按照日語的語順，把日本漢字音與和語組合起來，再來閱讀。訓讀法可以追溯到奈良時代，但真正在日本社會普及還是在江戶時代。江戶時代的武士階級基本是通過訓讀的方法學習四書五經等中國古典，並將之內化為教養。日語中有關政治、思想、倫理的詞彙幾乎完全依附於中國古典，當時的人們正是通過漢學這一中國古典學習而達到自我形成。因此，中國古典學習與訓讀是一對無法分割的存在，否定訓讀就會給人一種否定自己的文化背景的印象。而京都的中國學以歐洲中國學為自己的一個淵源，講究把中國古典作為外國的文化進行客觀的實證的研究，具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論。所以，用現代漢語閱讀學習中國古典也就成為一種很自然的方式。早在明治初期，重野安繹（成齋）（1827-1910）就表達過這一見解。明治12年（1879），重野在東京學士館進行講演，提出要與清國進行交涉，首先必須培養具有高度會話能力和讀解能

<sup>22</sup> 陶德民 Tao Demin：〈近代における「漢文直讀」論の由緒と行方—重野・青木・倉石をめぐる思想状況—〉“Kindai ni okeru ‘kanbun chokudoku ron’no yuisho to yukue”—Shigeno・Aoki・Kuraishi wo meguru shisô jôkyo—，收入中村春作 NAKAMURA Shunsaku、市來津由彦 ICHIKI Tuyuhiko、田尻祐一郎 TAJIRI Yuichiro、前田勉 MAEDA Tsutomu 編：《“訓讀”論——東あじあ漢文世界と日本語》“Kundoku”ron—Higashi ajia Kanbun sekai to Nihon’go--（東京[Tokyo]：勉誠出版[Bensei shuppan]，2008年），頁49-85。以下參見陶德民文。

<sup>23</sup> 有一種說法提出該文原預定在創刊號刊發，後考慮到當時的政治情況，而拖到第5號。又，該文在收入《支那文藝論叢》*Shina bun’gei ronsô*時，改題為〈漢文直讀論〉“Kanbun chokudoku ron”。

<sup>24</sup> 〈本邦支那學革新的的第一步〉一開篇，就引用了早在江戶時代便主張漢文直讀的荻生徂徠〈譯文筌蹄序〉，表示贊同。關於荻生徂徠對訓讀的批判，可參照田尻祐一郎 TAJIRI Yûichiro：〈“訓讀”問題と古文辭學——荻生徂徠をめぐる〉”“Kundoku’mondai to kobunjigaku—OGYÛ Sorai wo megutte”：收入《“訓讀”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Kundoku”ron—Higashi ajia kanbun sekai to Nippon（東京[Tokyo]：勉誠出版[Bensei shuppan]，2008年）；而有關東亞的訓讀現象問題可參見金文京 KIN Bunkyô：《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讀の文化圏》*Kanbun to higashi ajia—kundoku no bunkaken*（東京[Tokyo]：岩波書店[Iwanami shoten]，2010年）；至於語言接觸問題，可參閱高津孝 TAKATSU Takashi：〈ビジン・クレオール語としての訓讀〉“Pijin Kureôru go toshitenno kundoku”，收入《“訓讀”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此外亦有《續“訓讀”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Zoku“Kundoku”ron—higashi ajia kanbun sekai no keisei*（東京[Tokyo]：勉誠出版[Bensei shuppan]，2010年）。

力的人才，而傳統的訓讀學習只是理解文章內容，屬於「異樣」的漢學，「非和非漢的讀法」（訓讀）應該廢止。在當時那種西學一邊倒的時代，這種謀求漢學再生之路的主張非常值得關注。重野認為，在明治初期，正如國家需要既有歐美語言應用能力又有歐美文化教養的人才一樣，作為日本近代化事業的一部分，社會也需要將中國古典外在化、培養具有現代中國語應用能力和中國古典文化教養的人才，而這同時也是漢學再生之路。然而，40年過去了，事態並無改變。青木認為訓讀有三個弊端：閱讀速度慢、無法理解漢語固有的語法、不易正確理解文章意義。這三點，即在理解中國古典文章方面存在弊端尤其重要。青木的漢文直讀論，得到時為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文學科學生倉石五四郎的共鳴。於是，倉石從東京大學畢業後，就考入京都帝國大學的研究生院，成為狩野直喜的學生。倉石說，當時在東京，持否定訓讀意見的人都被視為危險人物。<sup>25</sup>大正7年，上田萬年提倡廢除中學的漢文科，遭到漢學陣營的反對，他們成立了一個很大的團體——「斯文會」，呼籲振興漢學，表現出國家主義傾向。大正10年（1921），也就是青木論文發表的翌年，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鹽谷溫（1878-1962）<sup>26</sup>發表文章，擁護訓讀：「或有學者排斥訓讀，主張應直接音讀，如教授英法德語一般，此乃全然無視訓讀歷史、視漢文為外國語的謬見。……基於訓讀法的漢文即是日本的漢文，應視之為國文。」<sup>27</sup>至於大正12年（1923）發表的〈現代教育與漢文〉<sup>28</sup>一文，其政治色彩更加強烈，聲稱漢文發揮了日本國體的精華，用日語閱讀才能發揚國家主義的日本精神，對訓讀持有異議者就是反傳統主義者，就是中華崇拜主義者。在當時瀰漫著國家主義氣氛的環境裡，漢文直讀論被視為危險思想。和東京相比，京都中國學界的國粹主義氣氛還不那麼強烈，至少青木的〈漢文直讀論〉還能夠在雜誌發表。也就是說，擺脫江戶時代以來的漢學傳統，把中國文化作為外國文化，進行客觀實證研究的土壤依然存在。

<sup>25</sup> 倉石武四郎 KURASHI Takeshirô：《支那語教育の理論と實際》*Shinago kyôiku no riron to jissai*（東京[Tokyo]：岩波書店[Iwanami shoten]，1941年），頁190-191。

<sup>26</sup> 鹽谷溫是倉石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時的老師。

<sup>27</sup> 鹽谷溫 SHIONOYA On：〈漢文原型教授の價值〉“Kanbun genkei kyôju no kachi”，《漢文と中等教育》*Kanbun to chû tô kyoiku*（東京[Tokyo]：斯文會[Shibun kai]，1921年），頁60-61。

<sup>28</sup> 鹽谷溫 SHIONOYA On：〈現代教育と漢文〉“Gendai kyôiku to kanbun”，《斯文》*Shibun* 第四編第二號（1923年），頁34-35。

倉石武四郎（1897-1970）<sup>29</sup>出生於新瀉，從縣立高田高等學校畢業後，於大正 4 年（1915）考入第一高等學校，大正 7 年（1918）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文學科，大正 10 年（1921）畢業後，先作文學部副手（助手），大正 11 年（1922）進京都帝國大學研究生院，接受狩野直喜指導。大正 15 年（1926）任京都帝國大學專任講師，昭和 2 年（1927）4 月昇任副教授。昭和 3 年（1928）作為文部省在外研究員赴北京，第二年花費大量精力，幫助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購入陶湘的藏書。昭和 5 年（1930）回國，在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清朝小學和清朝音學，也講授過魯迅作品。昭和 14 年（1939）以《段懋堂的音學》取得博士學位，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自昭和 15 年（1940）起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昭和 24 年（1949）赴東京專職東京大學教授，昭和 33 年（1958）退休。昭和 39 年（1964）設立中國語專修學校「日中學院」，親任院長，致力於教育和學院經營。

倉石在中國學上有很多貢獻。他在清朝考證學、特別是小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他對清朝有關中國古代語言的研究成果作過很好的整理和介紹；他運用精密的文獻學方法和自己豐富的中國古代語言知識，建立了注重歷史實證的中國古典研究。作為一個語言學者，它具有從中國古代語言到現代北京語以及各地方言的廣博學識，以辭書編纂和漢語教育為主，在許多領域為日本的中國語學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

#### 四、結語

明治維新之後，為了建立近代國民國家，日本設立帝國大學，旨在培養人才。為了推進近代化和產業化，必須擺脫單純依賴外國人的局面，自己培養出所需人才。人們期待精通西洋語言、掌握西洋技術的人才。但另一方面，大學又具有保護和培育國民國家固有文化基礎的功能。為此，在文學部設立和漢文學科，以保護在西學興盛中日益衰落的傳統學術。日本在發展自己的文化的過程中，尤其是思想政治語言領域，幾乎完全依附中國古典，日本的傳統學術離不開中國古代典籍。

<sup>29</sup> 以下均據京都大學文學部 *Kyoto daigaku bun'gakubu*：《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Kyoto daigaku bun'gakubu gojūnen shi*（京都[Kyoto]：京都大學文學部[Kyoto daigaku bun'gakubu]，1956 年）、戶川芳郎 TOGAWA Yoshio：〈解題〉“Kaidai”，《倉石武四郎著作集》*KURAIISHI Takeshirō chosakushū* 第一卷（東京[Tokyo]、くろしお出版[Kurosio shuppan]，1981 年），頁 429-452。

事實上，對日本人來說，長期以來日本人用訓讀這種特殊日語閱讀的中國古代典籍，已經內化成為日本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日本成為近代國民國家、日語也成為日本的國家語言的情形下，當人們構建以和語為中心的日本文學史時，這種通過日語的訓讀形式而被日本人閱讀的中國古代典籍的歸屬，便成為問題。在江戶時代，作為武士階級基礎教養的中國古代典籍以及理學教養，不被人們視為外國文學或外國文化。日本的知識分子通過訓讀這一特殊日語來學習中國古代典籍，並使之曾為自己內在的教養，對他們來說，把中國古代典籍作為外國文化進行外在的客觀研究，就意味著否定自己的內面<sup>30</sup>，用現代漢語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典籍簡直就是荒唐。繼承了江戶漢學的東京中國學慢慢傾向於偏狹的日本民族主義。但另一方面，在經歷日清、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開始考慮追趕歐美列強並向世界進發，從擴張領土野心，到「亞洲盟主意識」，以至於在知識學術的領域中也謀求走到前面。可以說，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學正體現了這一點，忠實地走過了日本近代化事業的完整過程：切斷江戶以來的漢學傳統，將中國古典作為外國文化加以外在化，導入尚未廣為人知的中國的最新學術——清朝考證學，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吸取歐洲中國學的方法論，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並結出豐碩的果實。

### 主要參考文獻

天野郁夫 AMANO Ikuo：《大學の誕生 帝國大學の時代》*Daigaku no tanjô Teikoku daigaku no jidai* 上・下，東京 Tokyo：中央公論社 Chûô kôron sha，2009年。

<sup>30</sup> 江戶時代的日本人將他們用訓讀方式閱讀的中國古典視為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對於今日的中國人來說，也許有些唐突或者費解。本文的目的，主要是介紹描述這一曾經存在於日本思想文化史中的現象和視角，至於如何看待這一視角的有效程度，必然涉及到近代國民國家的形成及其對思想、文化、歷史、學術的影響，待其他機會筆者將專文考察。簡單說，近代國民國家的形成，產生出由共同的領土、語言和民族所構成的國民，而作為近代之前的普遍存在的文化思想、書籍、文學家和思想家等，也會根據不同的地域和語言等分割到各自不同的國民國家。有時候，不同的國民國家也許會為它（他）們的歸屬而相互爭奪。近代日本的初期，就曾有過以法語為日本國語的想法。如果真的那樣，所謂的古典必將發生極大變化，中國古典文化或許會從日本完全消失。語言的選擇直接關乎教育，並將決定其後的國民文化的方向。近代日本在若干種選擇中，選定日語作為國語。日本文學史的構想是國民國家的邏輯歸結，意味著使用日語對文化重新進行整理編排。然而，在教育領域中，中國古典的教育一直以訓讀為媒介。因為在現實中，那些支撐近代日本的精英們的文化背景無不有賴於中國古典的素養。有些日語論者對此抱有不滿，常常呼籲把中國古典以及訓讀從教育領域排除出去。訓讀論者的危機意識即源於此。

- 中村春作 NAKAMURA Shunsaku、市來津由彥 ICHIKI Tsuyuhiko、田尻祐一郎 TAJIRI Yûichiro、前田勉 MAEDA Tsutomu 編：《“訓讀”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 “*Kundoku*”ron—*Higashi ajia kanbun sekai to Nippongo*”，東京 Tokyo：勉誠出版 Bensei shuppan，2008 年。
- 江上波夫 EGAMI Namio 編：《東洋學の系譜》*Tôyôgaku no keifu*，東京 Tokyo：大修館書店 Taishû kan shoten，1992 年。
- 東京大學百年史編輯委員會 Tokyo daigaku hyakunen shi henshû iinkai：《東京大學百年史 部局史一》*Tokyo daigaku hyakunen shi bukyoku shi ichi*，東京 Tokyo：東京大學出版會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86 年。
- 東京帝國大學 Tokyo teikoku daigaku：《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Tokyo teikoku daigaku gojûnen shi*，東京 Tokyo：東京帝國大學 Tokyo teikoku daigaku，1932 年。
- 京都大學文學部 Kyoto daigaku bun'gakubu：《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Kyoto daigaku bun'gakubu gojûnen shi*，京都 Kyoto：京都大學文學部 Kyoto daigaku bun'gakubu，1956 年。
- 京都大學百年史編輯委員會 Kyoto daigaku hyakunen shi henshû iinkai：《京都大學百年史 部局史編一》*Kyoto daigaku hyakunen shi bukyokuhen ichi*，京都 Kyoto：京都大學後援會 Kyoto daigaku kôenkai，1997 年。
- 連清吉 Lian Qingji：《日本京都中國學與東亞文化》*Riben Jingdu Zhongguoxue yu Dongya wenhua*，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2010 年。
- 張寶三 Zhang Baosan：《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論集》*Tangdai jingxue ji Riben jindai Jingdu xuepai Zhongguoxue yanjiu lunji*，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2007 年。
- 礪波護 TONAMI Mamoru、藤井讓治 FUJII Jôji 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Kyôdai tôyôgaku no hyakunen*，京都 Kyoto：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Kyoto daigaku gakujutsu shuppankai，2002 年。

### 審查意見摘要

#### 第一位審查人：

在思考現代日本中國學的確立、發展時，絕不能忽略近代京都帝國大學學者們的中國學研究，亦即京都中國學派的貢獻。我們可以說非常注重依據文獻之實證性研究的現代日本中國學研究，基本上乃是繼承了京都中國學的學風，在這個意義上，了解京都中國學派的研究特色等於了解現代日本中國學研究的特色。本文主要在介紹以狩野直喜、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倉石武四郎等京都中國學派的代表性學者之重要著作以及其學術特色，其內容、論述非常清晰而扼要，可以說是一篇向國際世界介紹、說明日本中國學的好文章。日本京都學派的研究成果歷來也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相關研究也不少，但如本文用中文簡明扼要介紹其學術特色的文章並不多，審查者非常肯定本文對中文學界所提供的重要助益。

####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藉由介紹戰前任教於京都帝國大學的狩野直喜、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倉石武四郎等四人之學術，試圖描繪出京都帝國大學自設立至二戰結束，彼等所從事的中國文學研究之概貌。基本上作者所舉出之四位所謂「京都學派」之學者，皆具有代表性，也可凸顯出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學研究，擅場乃由小說、戲曲、語學等領域的研究建構發足，對希望初步理解近代京都中國文學研究之開展輪廓的讀者而言，可謂簡單明瞭，足以立刻掌握。在日本以外的中國學學界，多數對日本京都學派的研究成果抱持高度興趣，歷來相關研究也不少，然本文簡明扼要地介紹其學術特色，是很好的入門文章，可對中文學界有所助益。故審查者認為本文作為一篇介紹性文章，堪稱非常成功，同時也肯定本文對中文學界，尤其是儒家思想研究者，必能提供莫大之助益。

